

萧纲与楚辞^{***}

□陶琳 [浙江大学 杭州 310027]

【摘要】 本文通过对梁简文帝萧纲的生平经历、文学理论以及诗文创作的分析研究来考察萧纲与楚辞的关系,进而对楚辞的艺术性以及后世文人的影响,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关键词】 楚辞; 萧纲; 经历; 理论; 创作

【中图分类号】J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105(2006)02-0083-05

以屈原创作为主体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对后世影响巨大。历代文学评论家对此都有所论述,如刘勰曰:“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气往铄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于并能矣。……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1]又如胡应麟曰:“屈原氏兴,以瑰奇浩瀚之才,属纵横艰大之运,因牢骚愁怨之感,发沈雄伟博之辞。上陈天道,下悉人情,中稽物理,旁引广譬,具网兼罗,文词巨丽,体制闳深,兴寄超远,百代而下,才人学士,追之莫逮,取之不穷。使谓争光日月,诎不信夫!”^[2]

应该说,楚辞一直影响了中国文学两千多年,它不仅在五、七言诗方面肇开先河,而且在艺术手法上,对古典文学具有广泛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对楚辞的研究评价之风则自汉代开始就绵绵不断。汉人依《经》立论,如扬雄、班固、王逸等人,都是以经文经义为准绳来品评屈原骚体的。时至南朝,随着文学意识的觉醒高涨,在楚辞的研究及其创作实践上,则冲破了汉代经学的桎梏,代之以文学为主的探索。在提到这一时期研究楚辞的大家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便是刘勰、钟嵘、裴子野、萧统等人。的确,他们著书立说,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议论,为楚辞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推动了文学新思潮的发展。然而笔者认为,作为梁代后期文学的倡导者及中坚力量的梁简文帝萧纲,对楚辞的研究与继承发展亦有不可忽略的贡献。那么,究竟萧纲与楚辞的关系如何?萧纲在楚辞学史上的地位又是如何呢?

—

萧纲(公元503—551年),字世缵,小字六通,南朝梁武帝第三子。4岁时被立为晋安王,中大通二年(公元530年),为都督南扬、徐二州诸军事,骠骑将军、扬州刺史。次年四月,昭明太子萧统卒。五月,萧纲被继立为皇太子,入住东宫19年。太清三年(公元549年),梁武帝死后,他被叛将侯景拥立为傀儡皇帝,但不过两年即被害死。梁元帝萧绎即位后,尊其号为“简文皇帝”。

《梁书》本纪云:

(天监)十三年,出为使持节、都督荆、雍、梁、南北秦、益、宁七州诸军事、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将军如故。十四年,徙为都督江州诸军事、云麾将军、江州刺史,持节如故。……(普通)四年,徙为使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平西将军、南蛮校尉、雍州刺史。……(中大通)二年,征为都督南扬、徐二州诸军事、骠骑将军、扬州刺史。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天监十三年,萧纲12岁时,曾任荆州刺史一职。普通四年,萧纲21岁时,又任雍州刺史一职,历时约八年。萧纲还作有《玩汉水》、《入溱浦》等诗篇。由此可知,萧纲曾到过湖南、湖北一带,在长江、汉水流域生活多年。因而可以说,萧纲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受到楚地文化的熏陶。

楚辞的第一位大作家屈原的家乡在今湖北秭归。秭归在当时属荆州。北魏郦道元(公元446年或472—527年)《水经注·江水注》中引袁山松《宜都

* [收稿日期] 2005-06-18

** [作者简介] 陶琳(1979—)女,浙江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04级博士研究生。

记》云：

秭归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垆堰靡漫，犹得原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虽畦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庙，捣衣石犹存^[3]。

这些传说与记载，在北朝的郦道元尚且如此清楚，曾任荆州刺史的萧纲当知道更多关于屈原的传说，甚至很有可能曾去过本州管辖下的秭归。

萧纲在雍州治所的时间长达八年之久，几乎度过了他的大部分青年时期。唐代杜佑《通典》云：

宋文帝割荆州置雍州，号南雍。魏、晋以来，常为重镇，齐、梁因之^[4]。

雍州，即襄阳，春秋战国时为楚国的一部分。据《战国策·楚策一》记载：

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陞之塞、郢阳。地方五千里……

文中所指位置大约包括今之湖北、湖南、安徽、江苏，以及陕西、河南、四川、贵州的一部分。光辉灿烂的楚辞文学正是在这片物产丰茂、艺术兴盛的广袤疆域上诞生的。虽然楚辞自汉以降，渐趋式微，但楚辞的直接流脉，始终清晰可见。概言之，大体有二：其一，衍变为各类诗歌；其二，化生为赋。自幼爱好文学的萧纲，身处在这样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下，显然很有可能受到楚辞的影响。

二

萧纲自幼聪明博学，“读书十行俱下，辞藻艳发，博综群言，善谈玄理^[5]”。他长于文辞，富于著述，有文集一百卷，杂著六百卷，数量之多，为历代帝王所罕见。其中最能代表他的文学见解和楚辞观的是《与湘东王书》。文中，萧纲在批评“京师文体”时论及了《楚辞》：

比见京师文体，儒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宴，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5]

所谓“京师文体”，当指在复古文学思想影响下的京师文风。所谓“儒钝”、“浮疏”、“阐缓”，就是规摹经

诂文体和“庙堂”文学，从而形成的不近性情、呆板空疏、僵滞烦冗、缺乏诗美的创作风气。萧纲认为应当把文学作品的写作与经典著作的著述区别开来，文学创作既不能从儒家经典著作中寻找灵感、搜集素材，更不能刻意摹拟、依经立意。因为这两者有着不同的写作目的、写作意图，不同的构思以及不同的表述方式。抒情、写景、言志的文学作品是作者有感于外物，通过艺术的思维活动，把外物所引发的审美感受、审美愉悦以及审美联想，借助于一定的艺术手法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说，萧纲不仅意识到了文学作品与经典著作的区别，而且看到了文学作品的审美意义与审美价值，进而强调了文学的审美性。

萧纲在这里虽然没有明确地说出“吟咏情性”一类作品，应当遵循怎样的审美要求，但从他对当时诗风的品评中，不难窥见其创作取向和审美追求。他批评当时一些使他不满意的文风，因为那些作品“即殊比兴，正背风骚”。背离了《诗经》、《楚辞》写景、抒情的比兴传统，自然就不会对客观物象有真切敏锐的审美感受，也就不会产生真挚感人的艺术魅力。同时，萧纲在《答新渝侯和诗书》一文中，则明确表达了他的文学观。他称赞新渝侯萧暕三首描写美人之风姿体态的闺愁宫怨和诗，是“风云吐于行间，珠玉生于字里”的“性情卓绝，新致英奇”之作。由此可知，在萧纲看来，“吟咏情性”一类的制作就是指那种内容是抒情情志、形式上华美丽靡的文学作品。

在《与湘东王萧绎书》中，萧纲指出“湛湛江水”是美的，与《大传》的质朴玄奥是不同的。“湛湛江水”句出自《楚辞·招魂》。以此衡量，他认为楚辞作品是符合唯美主义标准的。楚辞起源于富有浪漫山野之气的先秦楚文化土壤，风格瑰丽，文采绚烂，充满浪漫情怀。因而楚辞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与萧纲的审美情趣契合，得到他的认同。实际上，萧纲已经把《楚辞》看作了“吟咏情性”的唯美主义文学作品的典范。

萧纲关于对楚辞的论述，虽只有只言片语，不成系统，但从中已可看出，他对楚辞艺术成就的赞赏，主要着眼于情感和文采两个方面。

首先，萧纲十分重视诗文的情感特征。从《尚书·尧典》到《毛诗序》，儒家一直恪守着“诗言志”的传统，直到魏晋才有所改观。陆机在《文赋》中明确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言“缘情”而不论“言志”，认为诗用来抒发内心情感不必受礼制的束缚，遂开一代风气。齐梁时，人们虽然仍在“情志”的名目下讨论文学，搬用汉儒《诗大序》的“吟咏情性”说，但已有了本质的不同。儒家道德规范下“志”的内涵已被

抽掉,其时已声色大开,走的大都是“缘情”的路子。如钟嵘从文学角度出发,指出了情的哀怨成分,摆脱了儒家讽谏说的影响,对“吟咏情性”的理解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他认为情来源于自然社会两方面,从而把《乐记》和《文赋》提出的物感说推演了一步,在理论上揭示了社会生活环境决定诗人创作这一命题。对于情的来源,萧纲也同钟嵘一样,接触到“感物而动”、“吟咏性情”的命题,即社会生活决定人的思想感情以及人的情感在创作中自然流露。他在《答张缵谢示集书》中道:

时命亲宾,乍动严驾,车渠屡酌,鸚鵡骤倾,伊昔三边,久留四战,胡雾连天,征旗拂日,时闻坞笛,遥听塞笳,或乡思惻然,或雄心愤薄。是以沉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

“寓目”就是眼中所见;“写心”就是表达内心感受。这和钟嵘指出诗歌“吟咏情性”的特点时,强调的“即目”、“所见”相类似。萧纲又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道:

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

这是一封诫子之书,应是其肺腑之言。萧纲告诉儿子,立身必须首先要谨守儒家礼义之道,即“砥身砺行,由于经术”。在勉之以“立身之道”后,他又教之以为文之道:“文章且须放荡”,即文学创作可以摆脱儒教礼义的束缚与拘限,可以“发乎情”而不必“止乎礼义”。他所倡导的宫体诗就是这一理论的实践产物。

楚辞,尤其是屈原的作品,汉人是放在“言志”的范围内看待的,而事实上其“志”已变。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一书中指出,屈原“虽也歌咏一己之志,却以一己的穷通出处为主,因而‘抒中情’的地方占了重要的地位”^[6]。的确,楚辞深于情。屈子之情充塞八极、弥漫寰宇。他为战乱漫延、民不聊生而哀:“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怒。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哀郢》);他为楚国君王而哀:“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离骚》);他为自己的理想无由实现而哀:“既莫足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与悲相对,屈原还喷吐了自己的怨怒之情。他为君主的反复无常而怨:“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离骚》);他为精心培养的人才的变节而怨:“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荒芜”(《离骚》);他为奸佞党人的嫉贤妒能而怨:“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离骚》)。因此,萧纲侧重于从情感方面赞赏《楚辞》,比起汉儒强调忠君

讽谏之意,更能触及《楚辞》的艺术价值。

其次,萧纲惜采重文,十分强调“文”的重要性。他在《昭明太子集序》中道:

窃以文之为义,大哉远矣!故孔称性道,尧曰钦明,武有来商之功,虞有格苗之德。故《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以含精吐景,六上九光之度,方珠喻龙,南枢北陵之彩,此之谓天文。文籍生,书契作,咏歌起,赋颂兴,成孝敬于人伦,移风俗于王政,道绵乎八极,理浹乎九垓,赞动神明,雍熙钟石,此之谓人文。

由自然万物的“天文”推到“人文”,提高了“文”的地位,其论证方法与昭明太子的《文选序》如出一辙。所谓“人文”,范围很广,指一切文化学术,包括封建礼乐制度、儒家经典以及诸种文体文章。“天文”与“人文”相附会,强调了文章的社会功能和地位。在萧纲笔下是对所有文章统而言之,这样就把“吟咏情性”这类与政教无直接关系的诗文,抬到崇高的地位了。萧纲也十分重视艺术形式之美。如他在《临安公主集序》中道:“文同积玉,韵比风飞。谨求散逸,贻厥于后。”又如他在《昭明太子集序》的结尾,称道昭明的诗文“近逐情深,言随手变,丽而不淫。”由此可见,萧纲所追求的“篇什之美”,大体同刘勰《文心雕龙》中总结的“情文”、“声文”、“色文”要求相类似。

汉代士人对《楚辞》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对屈原的遭遇、立身行事、人格和沉江殉志等问题的评价上。纵观两汉,从贾谊到王逸,对屈原的评价,经过了怀疑、否定到全面肯定。这是从以黄老思想到正统儒家思想接受和重塑屈原人格精神的过程,儒家思想通过自身的斗争、整合,寻求到了对屈原及其作品完善、系统的阐释。两汉屈原问题的讨论,一方面使楚辞学从一开始就迈出了一大步,取得了像王逸《楚辞章句》这样可喜的成果,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依经按骚的思维方式使楚辞的研究始终游离在真正的艺术探讨之外。直到齐梁时代,楚辞才作为文学作品,引起人们的重视。正如刘勰所说,屈原之作“惊采绝艳”;《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环诡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艳而深华。“惜采重文,对文学创作来说就是重视文学自身的规律。萧纲从文采的角度对楚辞的艺术成就给以赞赏,体现了他对文学特征的重视。而只有以审美的态度来审视文学,才更能揭示文学的本质,萧纲对楚辞的评价便证明了这一点。

萧纲“幼而敏睿,识悟过人,六岁便属文,高祖惊其早就,弗之信也。乃于御前面试,辞采甚美。高祖叹曰:‘此子,吾家之东阿’”。年长后,更是“篇章辞赋,操笔立成”。他又喜好写诗,自称:“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所作诗赋多写艳情,风格妖冶艳丽,风靡一时,号曰“宫体”。史臣称其:“文艳用寡,华而不密,体穷淫丽,义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风俗。”可见其对当时文风的影响。

真正进入文人创作的时代应当从屈原开始,所以沈约说:“屈原、宋玉导清源于前”。屈原的骚体诗,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影响是很大的。历代文人没有谁不读楚辞,不受到楚辞的影响,萧纲亦不例外。萧纲的诗赋创作与楚辞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萧纲摹仿楚辞的“兮”字句形式,创作的骚体诗——《应令》诗。

诗云:

鑫浦急兮川路长,白云重兮出帝乡。平原忽兮远极目,江甸阻兮羈心伤。树庐岳兮高且峻,瞻派水兮去泱泱。远烟生兮含山势,风散花兮传馨香。临清波兮望石镜,瞻鹤岭兮睇仙庄。望邦畿兮千里旷,悲遥夜兮九回肠。顾龙楼兮不可见,徒送目兮泪沾裳^[7]。

全诗十四句,用的全是“三字结构+兮+三字结构”的句式,这也正是《九歌》中典型的句型之一。

第二,萧纲的很多诗赋,沿用了楚辞中的语句。

语句上的沿用,如《述羁赋》中的“涕淫淫其若霏”一句,出自《九章·哀郢》。又如《应令》诗中的“顾龙楼兮不可见”一句,出自《九章·哀郢》的“顾龙门而不见”句。再如《秋兴赋》中的“洞庭之叶初下”一句,出自《九歌·湘夫人》的“洞庭波兮木叶下”句。

第三,萧纲的很多诗赋,沿用了楚辞中的词语。

如《秋夜》中的“高秋度函谷,坠露下芳枝”、“坠露”一词,出自《离骚》中的“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句。又如《赠张纘》中的“九疑势参差,江天相蔽亏”、“九疑”一词出自《九歌·湘夫人》的“九疑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句。又“三春澧浦叶,九月洞庭枝。洞庭枝袅娜,澧浦叶参差”句,其中的“澧浦”、“洞庭”两地名,是楚辞中较为常见的地名。如《九歌·湘君》中云:“驾飞龙兮北征,吾道兮洞庭”,又云:“捐余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醴”与“澧”通)。又如《九歌·湘夫人》中云:“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又云:“捐余袂兮江中,遗余兮醴浦”(“醴”与“澧”通)。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此不一

枚举。

第四,萧纲诗赋中的很多地方,化用了楚辞的意思。

如上文提到的《应令》诗中,主人公离别故都、乘舟远行的情节,以及回望故都已遥不可见的悲伤之情,显然是对屈原《九章》中的《涉江》、《哀郢》等诗篇的一种摹写。又如《采莲赋》云:“常闻渠可爱,采藕欲为裙。”楚辞中常说到以香草为衣裳装饰,采荷为裙之说,系从《离骚》中的“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句化用而来。又如《秋兴赋》云:“淹留而荫丹岫,徘徊而攀木兰”,系从《离骚》中的“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句化用而来。

第五,最值得注意的是萧纲的宫体诗赋对楚辞中的女性题材的继承与发展。

楚辞虽然主要用来宣泄诗人内心的不平,但其中也不乏描写女性的作品。屈原的组诗《九歌》中就有几篇是女神的礼赞,如《湘夫人》、《山鬼》、《少司命》等。屈原笔下的女神大都写得要眇宜修、神采灵动。与屈原并称的宋玉,更是以浓墨重彩酣畅淋漓地展现女性美,如他在《招魂》中对侍女明眸善睐和女乐长袖善舞的描绘。当然,最具代表性的还是他的《高唐赋》、《神女赋》以及《登徒子好色赋》等篇。另一首作者难明的《大招》,也很醉心于女性美的刻画,不仅描绘美人们的容貌、姿态、装饰,而且深入展现其心灵性情。其中“朱唇皓齿”、“丰肉微骨”、“小腰秀颈”之类的用语更是颇为华丽与明艳。

萧纲现存的宫体诗赋,对楚辞中的女性题材的继承与发展,是非常显著的。就宫体诗而言,萧纲便以女性为题材的作品数量最多。从内容上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描摹女性的外貌以及女子活动的,如《美女篇》、《江南弄·采莲曲》、《美人晨妆》、《咏内人昼眠》、《和徐录事见内人卧具诗》、《戏赠丽人》、《咏美人看画》等等,大多文字纤巧,格调轻浮。且看这首《戏赠丽人》:

丽妲与妖嬈,共拂可怜妆。同安鬟里拨,异作额间黄。罗裙宜细简,画屐重高墙。含羞来上砌,微笑出长廊。取花争间镊,攀枝念蕊香。但歌聊一曲,鸣弦未肯张。自矜心所爱,三十侍中郎。

诗中起首六句写一对丽人的梳妆打扮:她们都是以拨为簪插在鬟中,但所贴的花黄却各不相同;系上打着细褶裯的罗裙,穿好彩画的高鞋帮鞋子。“含羞”以下写这对丽人的神态动作:她们含羞带笑,迤逦行来;一路上摘取花朵,争着插在发间,与簪钗上的宝钗

交相掩映生辉,她们还攀下花枝,嗅吸着花蕊的清香;走到众人面前,她们聊且清唱一曲,不肯拨弄丝弦奏乐,原来她们的心上人年轻显赫,怪不得这样自矜任性。这首诗把这对丽人的妩媚、娇憨、任性,描绘得细致具体,活灵活现,流露出诗人的欣赏之情。

另一类是表现女子内心世界的,或抒发情思,或揭示心态,如《怨歌行》、《和人爱妾换马》、《秋闺夜思》、《伤美人》、《咏人弃妻》、《金闺思》等等,大多情调哀婉,意蕴缠绵,属传统的“闺怨”题材。且看这首《和人爱妾换马》:

功名幸多种,何事苦生离?谁言似白玉,实是愧青骊!必取匣中钏,作饰金羁。真成恨不已,愿得路旁儿。

诗的开篇二句便以问句形式,强烈地传达出少女心中的压抑和痛苦。接下来“谁言”二句声泪俱下,让弃妾的满腹苦恨、辛酸、哀怨与愤怒一齐喷涌而出。“必取”二句又承上两句反问语气而言。连她的故物也被一并交换它物,那薄幸男子的毫无心肝,从中益发可以想象。诗的最后两句,正面点出弃妾深深的怨恨:宁愿嫁给一个地位低贱的人,倒可以白头偕老,远胜于做那无情无义的贵公子的小妾。全诗以女子口吻抒发其遭受遗弃的悲苦之情,体现了诗人的同情之心。

至于萧纲的宫体赋中,亦有不少对女子情态的描绘。如《箏赋》云:

于是乎余音未尽,新弄萦缠,参差容与,顾慕流连。落横钗于袖下,敛垂衫于膝前,乍含猜而移柱,或斜倚而续弦。照琼环而俯捻,度玉爪而徐牵。见微之有趣,看巧笑之多妍,抗长吟之靡曼,杂新歌之可怜。歌曰:年年花色好,足待爱君傍。影入著衣镜,裙含辟恶香。鸳鸯七十二,乱舞未成行。故乃宋伟绿珠之好声,文君慎女之清角,上掩面而不前,言韬辉而耻学,

实独立之丽人,乃入神之佳乐。

又如《采莲赋》云:

于是素腕举,红袖长,回巧笑,堕明当。荷稠刺密,亟牵衣而绾裳;人喧水溅,惜亏朱而坏妆。物色虽晚,徘徊未反。畏风多而榜危,惊舟移而花远。

作者的审美感受力十分细致敏锐,用笔又颇轻灵,对女子的服饰、动作、神态及心理都有细致入微的刻画。

综上所述,从萧纲的生平经历来看,他少年时,很有可能到过湖南、湖北一带,青年时又极有可能在长江、汉水流域生活多年,因而深受楚地文化的熏陶及楚辞的影响;从萧纲的文学理论来看,他着眼于情感和文采两方面,对楚辞予以赞赏和推崇,认为楚辞作品是“吟咏情性”的唯美主义文学作品的典范;从萧纲的诗赋创作来看,无论是用词、句式,还是意思、题材,他的作品对楚辞都有很多继承与摹仿之处。总之,楚辞对萧纲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参考文献

- [1] 刘勰. 文心雕龙·辨骚篇[M]. 韩泉欣,校注.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20-23.
- [2] 胡应麟. 诗薮·内编(卷一)[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4.
- [3] 酈道元. 水经注·江水注[M]. 陈桥驿,注释.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531.
- [4] 杜佑. 通典[M]. 北京:中华书局,1984.943.
- [5] 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87.2996-3017.
- [6] 朱自清. 诗言志辨[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31.
- [7] 逯钦立.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 北京:中华书局,1983.1916.

Xiao Gang and Chu Ci

TAO Li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 shall make a review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Xiao Gang and Chu Ci. By studying Xiao Gang's experience, literary thoughts, poems and odes, I can find Chu Ci had profound influence upon Xiao Gang. So we can make a further comprehension of the art and influence of Chu Ci.

Key Words Chu Ci; Xiao Gang; experience; literary thoughts; poems and odes

作者: 陶琳, TAO Lin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 杭州, 310027
刊名: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 卷(期): 2006, 8(2)
被引用次数: 1次

参考文献(7条)

1. 刘勰;韩泉欣;校注 文心雕龙·辨骚篇 2001
2. 胡应麟 诗薮@内编 1979
3. 酈道元;陈桥驿;注释 水经注·江水注 2001
4. 杜佑 通典 1984
5. 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1987
6. 朱自清 诗言志辨 1996
7. 逯钦立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1983

引证文献(1条)

1. 牟华林 30年萧纲研究述论[期刊论文]-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1)

本文链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kjdxxb-shkx200602019.aspx